

“别筹革命之方”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入及论争

鲁法芹

摘要: 1907年6月,《天义》《新世纪》先后创刊。“天义派”和“新世纪派”是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旗手,其理论旨趣在于批判中国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并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批判资本主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相较于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具备“科学学理”基础的。其立论基础在进化论,特别是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基础上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更为鼓吹者所服膺。但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深层次原因,却被“别筹革命之方”即争夺“中国向何处去”领导权话语所遮蔽。由是,关于无政府主义是否契合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论争背后的实质性问题,即将生物界的科学理论机械照搬到人类社会发展上这一研究方法的错用,并没有被清醒地认识到,因此这次论争的最终结局也只能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分崩离析。而这一理论难题只有在唯物史观大面积传入中国并被自觉加以运用之后,才得以解决。

关键词: 天义派; 新世纪派; 无政府共产主义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19.01.006

1906年底到1907年8月,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国同盟会会员先后在巴黎和东京成立了“世界社”“亚洲和亲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三个组织并出版了《新世纪》《天义》两份机关报,这标志着中国同盟会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已名存实亡^①。但这决非一种简单的巧合现象。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视角看,当章太炎于1906年7月第三次抵达日本并接掌《民报》之时^②,《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围绕革命与改良的论战已趋于尾声,且梁启超业已发出了求和的声音^③,同时梁氏此时辩论的焦点集中到了社会主义问题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革命”以及“建构什么样的共和国”。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这是章太炎、“天义派”和“新世纪派”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这次论争表面上是在探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异同,实则在追问二者的学理基础何

作者简介: 鲁法芹,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威海 2642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主义论争文献汇编”(16FKS015)。

^① 汪荣祖在《章炳麟与中华民国》一文中指出:“从1908年到1911年,同盟会虚有其名。”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8页。

^②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1—122页。

^③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3—364页。

在，只不过这些深层次问题被“别筹革命之方”即争夺“中国向何处去”领导权话语所遮蔽罢了^①。

一、“别筹革命之方”的提出

1906年7月15日，在东京留学生举行的欢迎会上，章太炎作了关于“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是革命党人“近日办事的方法”的主旨演讲。章氏指出，中国的“国粹”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典章制度中蕴涵有丰富的“社会主义精神”，即便“刑名法律”和“科场选举”这两件“本是极不好的，尚且带几分社会主义的性质”，遑论早已被民生主义者充分引证的三代井田制度和魏晋至唐的均田制度。对于这些，章氏告诫革命党人“必定应该顶礼膜拜”^②。因此完全可以说，该次演讲透露出了章氏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均富主义与平等主义的综合体^③。只不过此时的平等话语，章氏采取的表达方式是借佛教法相宗的几部经典这个“新瓶”来装卢梭天赋人权平等思想的那壶“老酒”^④。事实是，将平等主义注入社会主义的肌体，为章氏从政治上批判资本主义预埋了伏笔。巧合的是，9月1日清政府颁诏预备立宪，为章氏思考政治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为驳斥康梁新党而写作的《箴党新论》，特别是章氏主编的《民报》临时增刊《天讨》所刊载的《论立宪党》一文，或许是开创革命党人明确批判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先河的一篇重要文献。《论立宪党》一文指出，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只是“财主、地棍、土豪”的民主，中国若“地权不平均，阶级不消灭，日后被选举的，一定是财主、地棍、土豪”^⑤。这倒为章氏稍前排斥“督抚革命”而主张“平民革命”提供了事实、经验和学理上的有力支撑^⑥。

在梁启超停笔论战之际，光复会另一主力人员刘师培携其妻何震、姻弟汪公权并苏曼殊一起，应章太炎之邀于1907年2月抵达日本东京^⑦，而此时日本社会党内部正围绕“采取直接的革命行动还是走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而发生着激烈的论战。此次论战在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意义，就是在“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之后，人们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开始认识到合法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局限性的结果”^⑧。众所周知，该次论战的结局则是幸德秋水领导的“硬派”即无政府主义派完全胜出，以至于幸德秋水及其思想完全支配了这一时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⑨。该派主张以直接行动、总同盟罢工为手段来实现无政府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初到日本的刘师培“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说，皆驰鹜焉。劬学，每至夜分不辍，精气疲茶，又不暇察迕言”^⑩。在无法廓清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本质区别的情况下，

① 参见《俄国革命之旨趣》之“译者识”，载《天义》第16/17/18/19四卷合刊，1908年3月。

② 参见太炎：《演说录》，载《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

③ 《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页。

④ 参见朱维铮：《〈民报〉时期章太炎的政治思想》，载《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

⑤ 楚元王：《论立宪党》，载《天讨》1907年4月25日。

⑥ 参见章太炎在《民报》纪念节庆祝会上的演说，载民意《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念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载《民报》第10号，1906年12月20日。

⑦ 万仕国编：《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97页。

⑧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9页。

⑨ 参见[美]伯纳尔：《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

⑩ 汪东：《辛亥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669页。

加之此前又曾将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纳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进行考察^①，此时的刘师培等人完全沉迷于“新说”而不能自拔，自是在情理之中。无独有偶，同年2月25日，初次与孙中山见面的刘师培却机缘于“倒孙风潮”的导火索之中^②。3月26日，章太炎致信幸德秋水，表达了“敬聆雅教”的强烈愿望^③，继而又与刘师培、张继、陶成章等人一起，成为这次“倒孙风潮”的主力。4月，响应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发出的“中国的革命家应与日本的社会运动家携手，东洋各国的社会党应该联合起来”的倡议^④，章太炎等人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了亚洲和亲会。由章太炎手笔的《亚洲和亲会约章》首次公开打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号^⑤，同盟会“民族主义”纲领被突破；6月10日，作为女子复权会机关报的《天义》出版，同盟会“三大纲领”被纳入其中^⑥；8月31日，社会主义讲习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公开亮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底牌^⑦，打出了进行“无政府革命”的旗号，既而宣称“由今而降，如有借社会主义之名，希望有政府者，决非吾人所主张之政策，虽目为仇敌，不为过矣”^⑧，从而走上了一条“别筹革命之方”的新路。

巧合的是，深受欧洲正统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于1906年12月在巴黎达卢街25号发起成立了世界社，并出版《世界》画报。《世界》创刊号宣称：“吾辈笃好进化之学理者，倾其心以欢爱于我黄种之同胞；吾愿吾之同胞，尔速来与吾辈握手。此即世界大同之始基，而博爱平等之区域，确然而定也。”^⑨换成毕修勺的话说，就是世界社的创始者在主张“联合同志，推翻异族的统治”的同时，提出了“万人平等，世界一家”的革命宗旨^⑩。换言之，“世界社”同人提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相结合的思想，从而达到“反刺孙文、黄兴”之目的^⑪。1907年6月22日，世界社创刊《新世纪》周刊作为机关刊物，并出版《新世纪丛书》和《新世纪杂刊》等，公开鼓吹无政府主义，声言：“本报纯以世界为主义。同人之意以为，苟能发愿与世界之种种不平等者为抵抗，一切自包其中，不必支支节节”^⑫。从而也走上了一条“别筹革命之方”的新路。

① 刘师培曾指出：“许行之言与西人无政府党最近。而无政府党之起原，则起于近世社会主义。盖嫉贫富不均而思所以革其弊，与许行嫉滕君厉民以自养者同一目的。及法人布鲁东创之于前，俄人巴枯宁继之于后。”参见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33页。

② 参见万仕国编：《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99页。

③ 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页。

④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8页。

⑤ 《亚洲和亲会约章》规定：“本会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参见《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7页。

⑥ 《天义》报《简章》之“宗旨及定名”条规定：“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故曰‘天义报’”。载《天义》第1号，1907年6月10日。

⑦ 刘师培在演讲词中宣称：“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也。”转引自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载《天义》第6卷，1907年9月1日。

⑧ 申叔：《社会主义与国会政策》，载《天义》第15卷，1908年1月15日。

⑨ [法]南达：《序》，姚蕙译，载《世界》第1期，1907年秋季。

⑩ 毕修勺：《世界社四十周年纪念》，载《自由世界论文集（新刊）》1946年1月。

⑪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遗稿），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页。

⑫ 《新世纪发刊之趣意》，载《新世纪》第1号，1907年6月22日。

二、“别筹革命之方”的内涵

通过上面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以《天义》《新世纪》的创刊为标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围绕“中国向何处去”展开了一场新的论战。这样,从同盟会中分离出来的中国无政府主义鼓吹者就首先受到了革命阵营中其他革命党人的指责。辨析无政府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异同,就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首先要阐释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考察、理解和把握他们“别筹革命之方”即鼓吹“无政府革命”的一个有益途径。

(一)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深化了同盟会的民族革命纲领,赋予了其反抗帝国主义的内容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首要历史任务,而推翻帝国主义和满清政府反动专制统治的共和革命则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为此,革命党人提出了“排满/种族革命”的口号。这一口号含有简单的民族复仇或大汉族主义的“种族革命”倾向,尽管这并不完全符合孙中山的本意,且在孙中山看来这一口号本身就是“政治革命”的“毕其功于一役”^①。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并不简单排斥“排满/种族革命”主张,但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革命的理论基础和道德合法性。

“天义派”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指出:“夫满人之当排,非以其异族而排之也,特以其盗窃中国、握中国之特权。故仅言民族问题,不若言民族特权问题。”从民族不平等的视角出发,“吾人之对于满洲,惟当覆其君统,废其政府。君统既覆,则昔日满人之特权,其援君统而起者,均当归于消灭”。故“吾人之意,以为实行无政府革命,则满洲政府必先颠覆,满洲政府既覆,则无政府之目的可达,即排满之目的亦可达”。于是,“天义派”将“排满/种族革命”纳入到了“无政府革命”之中,“安得谓无政府革命,有妨于种族革命乎”^②。正是基于反“民族特权”以求得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初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后,刘师培进一步指出:“排满主义,不必以种族革命为目标,谓之阶级斗争之革命可也。”其理由是,“满人所居之地位”与“田主、资本家相同,而多数汉民均处劳动地位也”“故欲实行经济界之平等,以兴社会大革命,则抵抗旗人之法,与抵抗田主、资本家之法大约相同。若谓排满主义仅由种界及政治而生,与经济问题无涉,此则大谬不然矣”^③。用阶级斗争置换“排满/种族革命”,这是刘师培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但他没有进一步去探讨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经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是简单的从追求绝对平等这一道德制高点上接受了无政府主义。

“新世纪”派从“革命犹重进化也”的视角指出,“言排满,不若言排皇”,“排皇不过政治革命,犹不足以尽革命。至社会革命始为完全之革命”,而“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自由、平等、博爱、大同。欲致此,必去强权无政府,必去国界去兵,此之谓社会革命”。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说:“社会革命必自倾覆强权始,倾覆强权必自倾覆皇帝始。故曰:政治革命为

^① 孙中山曾明确指出:“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② 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载《天义》第6号,1907年9月1日。

^③ 《社会革命与排满》,载《衡报》第3号,1908年5月18日。

权舆，社会革命为究竟。”^① 在《与友人书论新世纪》一文中，他们又从进化的次第顺序上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由个人自私主义而进至种族革命与祖国主义，由种族革命与祖国主义而进至社会主义，同为公理良心之进化，所异者先后、小大耳。是以凡真主张种族革命与祖国主义者，皆可望其主张社会革命与大同主义，由进化公例而知之。”这里，“先后”是一个典型的“后胜于今”的时间进化观念，“大小”又等同于“规模”：“故言种族革命，不若言社会主义之政治革命也。然则吾人之昌言无种界无国界，亦非与种族革命及政治革命相背而驰也，但规模较大耳，彼所谋者不过一国之幸福，若我辈之所谋者，则世界之幸福耳。”^② 正是基于这种进化观，“新世纪派”指责“排满/种族革命”者所鼓吹的革命是“旧世纪之革命”^③，进而又斥责说：“今主民族主义者，即排满也。夫排满，则私矣。”“私”则体现在三个方面：“满人非尽恶也……而一网打尽，其私一”“汉人非尽良也……而置之不问，其私二”“不凭公道真理，而惟各以非吾族类者互相仇，其私三”，因此“民族主义者，复仇主义也；复仇主义者，自私主义也”^④。

巧合的是，“天义派”亦指出，“排满”与“保满”二派“揆以自利之心，两派一揆”，因为“彼倡保满，冀获权利于目前，此倡排满欲攫权利于异日”“排满亦出于私，与倡保满者相同”，因而“民族主义，乃不合公理之最甚者也”^⑤。刘师培进而又从学术之谬（华夏之防、种性之说）、心术之谬（黯者具帝王思想、卑者冀为开国元勋）、政策之偏（革命不外学生与会党二端）三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阐释，特别是从“学术之谬”视角批判“排满/种族革命”会导致产生狭隘的“民族帝国主义之说”的危险^⑥。而关于“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刘师培认为是“政府、资本家欲摄取异国之金钱，利其愚弱，制以威力，由是托殖民之名以扩政府、资本家之实有”^⑦，从而揭示了其经济侵略的本质。在为译著《排斥军国主义》加写的按语中，“新世纪派”人士亦指出：“军国主义者，即殖民帝国主义之先导，而世界扰乱之大因也，以其扰乱世界而排斥之，宜也。”^⑧ 同样也发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从而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同盟会民族主义革命纲领。

（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虚伪性的一面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以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为归宿，但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某些弊端，希冀以“五权分立”的方式来补救“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资产阶级选举制、议会制、共和制进行了严厉批判，特别是章太炎设计了一种“抑官吏，伸齐民”和“抑富强，振贫弱”的新政治制度，作为一种向无政府主义的过渡形式。

由于“新世纪派”人士曾长期生活在西欧，可以近距离观察西方政治运作的实际情况，从而对其弊端有着切身的实际感受。比如，褚民谊就对法国的政党政治提出了批评，认为法

① 真民（李石曾）：《革命》，载《新世纪丛书》（第一集），巴黎新世纪书报局1907年版。

② 《与友人书论新世纪》，载《新世纪》第3号，1907年7月6日。

③ 真（李石曾）：《续祖宗革命》，载《新世纪》第2号，1907年6月29日。

④ 民：《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再答来书〈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意〉》，载《新世纪》第6号，1907年7月27日。

⑤ 志达：《保满与排满》，载《天义》第3号，1907年7月10日。

⑥ 参见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载《天义》第6号，1907年9月1日。

⑦ 申叔：《亚洲现势论》，载《天义》第11/12合册，1907年11月30日。

⑧ [英]华伦西（华莱士）：《排斥军国主义》，载《新世纪》第39号，1908年3月21日。

⑨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国政府虽以“王党”为基础，但又在“贵族”和“工党”之间骑墙，“左则委蛇贵族，右则附和工党，其卒也，左不能安慰贵族之宿志，右不能满意工党之要求”，以至于“贵族”党的“麦第”出而“击法总统”^①，弄得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吴稚晖则痛斥西方议会为“少数各个人，瓜分一个人之专制”，而“此少数各个人，即所谓中流社会者是也”^②，与广大劳苦群众无涉，从而揭示了民主的资产阶级本质。以此为视角，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政体比起来，只不过是“少数执政者之于独夫，五十步与百步之间，所差甚微”。只要政府尚存，“所谓民权者，不过表面上一好名词，其实在相去其真义远矣”。于是，自由平等博爱也只是“大书特书于公建筑”上的象征符号而已^③。甚至斥责深受第二国际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假社会党”，指出：“社会党者，以大同为目的也，不先剪政府之爪牙，而使之徐倾，则大同之愿，何日可偿？此假社会党之所宜改良也。”^④

“天义派”则更是以诸如《政府者万恶之源也》《选举罪恶史》《议会之弊》《共和之病》《地方选举之流弊》《选举之徇私》等显著标题，对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特别是党争及其贿选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刘师培说：“彼所谓政党者，以虚伪之演说，蒙惑众听。一党得志，则扩张党员之权力，以遏抑他党，安得谓之为国民全体谋幸福耶。”^⑤“咸以贿赂之多寡，定党势之胜败。故总统之选举，内阁大臣之任用，均由贿赂之公行。议员亦然。”^⑥即使能够实行普选，其“多数决”的弊端也在所难免：“故议院之制、民主之政，被以一言，即众者暴寡之制也。以众暴寡，安得谓之平？”^⑦更何况现实则是“议政之权、选举之权，女子均鲜得干预”^⑧。更难能可贵的是，“天义派”认为，这种现象“非仅于偶呈之事见之，实为代议制度固有之弊”^⑨，从而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本质属性。而作为“天义派”临时盟员的章太炎^⑩，在现实政治层面鉴于欧美等共和国“爵位废而兼并行”的经验教训，设计了一个以“抑官吏，伸齐民”“抑富强，振贫弱”为宗旨的修正过渡方案。他说：中国建立共和政体以后，“当置四法以节制之：一曰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二曰官立工场，使佣人得分赢利；三曰限制相续，使富厚不传子孙；四曰公散议员（凡议员有贪污事，平民得解散之；议院本由民间选举，自当还付民间解散……），使政党不敢纳贿”。他认为这四种制度实行后，虽能造成“豪民庶几日微，而编户齐人得以平等”的状态，但“是四制者，特初级苟偷之法，足以补苴衅隙而已。欲求尽善，必当高蹈太虚”^⑪，从而进入一种虚无状态。

（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深化了中国同盟会社会革命的内涵

上文指出，中国同盟会的“排满”革命本身就是“政治革命”的“毕其功于一役”，由是

① 民：《此之谓共和政府》，载《新世纪》第81号，1909年1月23日。

② 燃：《议院为如何之一物乎》，载《新世纪》第81号，1909年1月23日。

③ 民：《续无政府说》，载《新世纪》第32号，1908年2月1日。

④ 真：《德国之社会党》“按语”，载《新世纪》第30号，1908年1月18日。

⑤ 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续）》，载《天义》第5卷，1907年8月10日。

⑥ 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续）》，载《天义》第7卷，1907年9月15日。

⑦ 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续）》，载《天义》第5卷，1907年8月10日。

⑧ 何殷震：《女子宣布书》，载《天义》第1号，1907年6月10日。

⑨ [俄]苦鲁巴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基础及原理（续）》，载《衡报》第6号，1908年6月18日。

⑩ 有学者指出，章太炎主导的“亚洲和亲会”是仿照“茹拉同盟”的模式建立的亚洲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团体，而刘师培的《亚洲现势论》一文可视为是该会的“宣言”。参见梁展：《世界主义、种族革命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的诞生——以〈天义〉〈衡报〉的社会主义宣传为中心》，载《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⑪ 太炎：《代议然否论》，载《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

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民报〉发刊词》所提出的“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深刻内涵。不过，这里所言的“社会革命”即民生主义，其内涵也仅涉及“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即经济革命，并希冀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之^①。正是“鉴于同盟会提出了社会革命是政治革命任务的补充（的观点），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以社会革命取代政治革命（的主张）”^②。在这一点上，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将平等主义特别是经济平等作为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从而超越了中国同盟会民生主义的经济范畴。

“天义派”在考察欧洲社会主义源流演变的基础上，认为实施民生主义只会造成一种被路易·勃朗曾斥责为“伪社会主义”的极其类似法国“国立工场”的结局，因为这种“伪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欲借国家之力，以均平财产”，而“今倡土地、财产国有之说者，说非不善。然不善用之，必致一切利权均为国家所垄断，以蹈法国国立工场之覆辙”^③。巧合的是，这种“伪社会主义”又极其类似于中国历史上汉武帝盐铁专营和王莽恢复王田等改革措施，因此“观于汉武、王莽之所为，则今之欲设政府，又以平均地权愚民者，均汉武、王莽之流也”^④。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民生主义者主张在推翻满清政府之后要建立新型政府，而“既有政府，即不啻授以杀人之具，与以贪钱之机。欲其不舞弊、不残民，安可得耶”^⑤？这是在忽视对政权的阶级性进行分析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对政府职能的恐惧症。正是出于这个担忧，章太炎亦指出：“若就民生主义计之，凡法自上定者，偏于拥护政府；凡法自下定者，偏于拥护富民；今以议院尸其法律，求垄断者唯恐不周，况肯以土田平均相配？”^⑥他们从中国历史典籍中找到了区田制后，认为推行此制才是“中国现今之急务”，奉劝“世有持民生主义者，不可不提倡此法”^⑦。但是，人们仍旧会问，在政府同样存在的情况，采取分区种田的区田制，就不会产生“欲借国家之力，以均平财产”的后果吗？

“新世纪派”成员李石曾在所译《克若泡特金学说》一文所加写的按语中说：“无政府与共产，二者相联，欲以政府行社会主义、经济平等者，非伪即误。”^⑧这是在辨析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区别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对之，褚民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概念“最为含糊”且“派头”即流派纷呈，而“主张共产者，都是无政府党。故无政府党，主张社会主义实行共产者”，因而“单说社会主义，是有毛病，因为现在有一般社会党，别名叫得假社会党，实则作官党”，他们“以其所倡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之说，最利于多数之贫民，以故生计界之不得志者，群焉趋之若鹜，几奉为民生之救主，而不悟其足以召乱而蹙国，正孟子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也”^⑨。从而间接批判了中国同盟会民生主义革命纲领。

三、“别筹革命之方”的学理依据

关于“新世纪”派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学理基础，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概

① 参见《军政府宣言》，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② [美] 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③ 申叔：《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载《天义》第6卷，1907年9月1日。

④ 申叔：《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载《天义》第5卷，1907年8月10日。

⑤ 志达：《政府者万恶之源也》，载《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⑥ 太炎：《代议然否论》，载《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

⑦ 申叔：《区田考序》，载《天义》第16—19卷合刊，1908年3月。

⑧ 真译：《克若泡特金学说（虚）》，载《新世纪》第16号，1907年10月5日。

⑨ 民：《驳〈时报·论中国今日不能提倡共产主义〉》，载《新世纪》第72号，1908年11月7日。

括道：“《天演论》出版后，‘物竞’‘争存’等语，宣传一时，很引起一种‘有强权无公理’的主张。同时有一种根据进化论，而纠正强权论的学说，从法国方面输进来……不但提倡政治革命，也提倡社会革命，学理上以互助论为根据的。”^①也就是说，“新世纪派”是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替代严复的“天演论”作为鼓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的。事实上，蔡元培的这个论断同样适合于“天义派”。《天义》《衡报》不仅刊载了克鲁泡特金的相关作品，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恰是“天义派”最早明确提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事实上，这一口号指向的就是“天演论”所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②，因为它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提供了“合理”的学理口实。

“天义派”认为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其立论之一就是所谓的“物类互相扶助”说和“空间无中心”说等所谓的“科学”^③。在刘师培看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恰具有这两个特征，因而克氏学说“于共产无政府主义最为圆满”^④。这是因为，第一，互助论可以纠偏进化论的缺陷。刘师培指出：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斯宾塞、赫胥黎“误解达氏之旨，以优胜劣败为公例，故强种欺凌弱种，惨虐频仍，视为分所应然。即一国之中，在上之人亦挟其权位，以凌贫弱，转目彼等为劣败，扰乱平和，蔑视公理，均赫胥黎诸氏‘惟争乃存’一语有以误之也”。相反，“若明于苦氏互助之说，则竞争者恒劣败，互助者始生存，而强权可以渐弭矣”。第二，“空间无中心”说可以类推出“无政府”状态。刘师培说：“若明于苦氏无中心之说，则政府机关可废，而人人可逃于人治之外”，即进入无政府状态，那时“必全废资本私有制度，解放劳动者，易为共同生产之组织。凡生产之物，均为一般社会之自由使用”，即按照“自由合意”的方式重新组织社会。总之，“苦氏此等学术，非惟为无政府主义之确证也，且足破现今学术之根据”^⑤。“足破现今学术之根据”自然包括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比如蒲鲁东和巴枯宁就仅“凭议论以为独断者也”而不足为凭，而克氏恰“鉴于仅用演绎论理者之谬误，复证于事实而求归纳之法”^⑥。换言之，按照“天义派”的解读，克氏无政府主义就是建立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之上的。按照此逻辑，在为译作《无政府主义之哲理同理想》加写的“按语”中，“天义派”将“互助论”纳入到社会主义一脉中去考察，认为克氏是对基德、欧文特别是傅立叶《四种运动论》所宣扬的互助精神的继承和超越^⑦。也就是说，在“天义派”看来，“互助”而不是“竞争”才是社会主义的真谛。

“新世纪派”不仅视进化论开人类历史一新纪元^⑧，而且指出：“进化者，前进而不止，更化而无穷之谓也。”^⑨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指出进化是“有顺序而无倒行”的，因此人类政治

①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127页。

② 有学者指出：“与关心严格意义上的生物进化相比，严复更关心进化主义在人类和社会中的普遍适用性。这样，‘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开始就在严复的进化主义中打上了烙印”。参见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增补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③ 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载《天义》第6卷，1907年9月1日。

④ 申叔：《苦鲁巴特金学术述略》，载《天义》第11/12卷合册，1907年11月30日。

⑤ 申叔：《苦鲁巴特金学术述略（续）》，载《天义》第13/14卷合刊，1907年12月3日。

⑥ 公权：《苦鲁巴特金之特色》，载《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⑦ [俄]苦鲁巴金：《无政府主义之哲理同理想》，载《天义》第16—19卷合刊，1908年3月。

⑧ 李石曾指出：“当世界未有进化学说，人类简单之观念，皆以为世界万物，各由元始之时，一一特别创造，永不更改；关于人治之一部分，亦遂不能跃出支那孟轲氏之范围，所谓一治一乱，终古循环而已。”参见[英]华伦西述：《达尔文一百年之纪念日》的按语，载《新世纪》第86号，1909年2月27日。

⑨ 真：《进化与革命》，载《新世纪》第20号，1907年11月2日。

制度史上“专制逊于立宪，立宪逊于共和，共和逊于无政府，乃顺序之比较，不外乎进化而已”^①。于是，“自进化学说，成为一科之学，于是影响于较玄之人事者，始确然共信无政府主义，在此后最近之世界，为较公之真理”^②。达尔文开创的进化论，或更为确切地说，视进化等同于进步的观念，是“新世纪派”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学理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新世纪派”对“天义派”的复古思想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典籍中的井田制、许行并耕之说、王莽新政以及王安石变法等举措“与共产生义有什么半点瓜葛”！一句话，“均而不匀，等于不均，故不若共产主义之最善也”，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才是共产主义的“大纲”和信条^③。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均平”烙印在“新世纪派”人士的脑海中依旧，只是不自知而已。这一点，又与“天义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刘师培在区分无政府主义流派及其宗旨的基础上说：“吾等则以无政府主义当以平等为归。”^④进而从追求绝对平等出发，刘氏设计了“人类均力”，即“以一人而兼众艺”的实施方案，认为“依此法而行，则苦乐适均，而用物不虞其缺乏。处于社会，则人人平等之人；离于社会，则人人独立之人。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均，非所谓‘大道为公’之世耶”^⑤？针对这种彻底打破固定分工的简单设想，署名“铲平王”的文章从无政府主义的视角提出了质疑并做了进一步的修正。“铲平王”指出：无论是巴枯宁还是克鲁泡特金等人，“其权标‘无政府’之名者，终难逃有政府之实”。“有政府之实”是指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自治组织，如“所谓‘公民会’、‘公会’、‘协会’、‘联合会’者，岂非即政府之别名耶”？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均力”的设想难于付诸实践。针对此，“铲平王”设计了“平等政府”的方案来纠正之。所谓“平等政府”，即“共产均力、无币无兵、全世界一平等政府”^⑥，从而将平等观念进一步推向了极端。

事实上，刘师培的“人类均力”设想隐藏着一种“劳动乃人之天性”的理论假说^⑦，而“新世纪派”更是把进化论视为科学公理而不容质疑，二者的实质均是一种变相的“进化主义”或“进化教”思维方式。这是章太炎与刘师培分道扬镳并与吴稚晖交恶的理论认识根源。为此，章太炎写作了《五无论》《俱分进化论》《四惑论》等文章加以辩解。针对“劳动者，人之天性，循其天性而谋进化”的说教，章太炎在《四惑论》一文中从人的主观评价角度出发，将“劳动”一词分解为“劳”与“动”，认为“动者人之天性，劳者非人之天性”，即“动”是人的自然天性而“劳”非是，于是“动至于劳，亦未有不思休息者”，因为“劳”若“有之，则父师所督率，生计所驱使云尔”。也就是说，“劳”是外力所迫使然，这多少带有一点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为别人劳动”的“异化劳动”的意味。继而章太炎又在进一步区分维持生计的必要劳动与愉悦劳动的基础上，认为“求进化者，不在行乐之劳，而在求福之劳；不在掉举之动，而在坚忍之动。若人皆自私其产，斯亦可也”。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

① 真：《答骚客书》，载《新世纪》第29号，1908年1月11日。

② 荷兰来稿：《人类原始说》按语部分，载《新世纪》第39号，1908年3月21日。

③ 民：《驳〈时报·论中国今日不能提倡共产主义〉》，载《新世纪》第72号，1908年11月7日。

④ 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载《天义》第4卷，1907年7月25日。

⑤ 申叔：《人类均力说》，载《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⑥ 铲平王：《世界平等政府谈》，载《天义》第13/14卷合刊，1907年12月30日。

⑦ 刘师培在批评“迫人于苦”对“人类均力”设想的责难时写道：“况‘苦’字之名，与‘乐’字为对待，苦为一己之所独，斯为之苦；若苦为众人之所公，苦外无乐，则苦乐之名已混，夫何身苦之足云？况好动为人民之天性，而工作之勤，转足为适其好动之性，则迫人于苦之说非也。”参见申叔：《人类均力说》，载《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欲其忍性就劳，则势所不行”，这是因为“人之天性，以动为趣，不以劳为趣；以劳而现乐者为趣，不以劳而求福者为趣”。因而章太炎指出：“若以进化为主义者，事非强制，即无以使人必行。彼既标举自由，而又预期进化，于是构造一说以诬人曰：‘劳动者人之天性。’若是者，正可名进化教耳。”^①换言之，章氏并不简单反对“进化”而是反对“进化教”或“进化主义”。以此立论，章氏斥责“新世纪派”鼓吹“进化者，其迷与求神仙无异”^②，主张采取“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③的态度来辩证看待进化学说。这也就是章氏写作《俱分进化论》一文的主旨所在。

四、结 语

作为晚清后起的一个流派，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辨析无政府革命与同盟会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异同，其主观目的是探求“别筹革命之方”，即争夺“中国向何处去”话语领导权。这种话语权的争夺却是以辨析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理基础为前提的。然而，在论争的过程中，各方都暴露了各自理论上的不足，这倒是出乎论争者的意料之外的。

“天义派”服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且将克氏归纳与演绎的研究方法视作为“科学”本身，加之自身的国学素养，轻易地将舶来的无政府主义与中国历史传统以及传统文化相比附，提出了“实行无政府主义，以中国为最易，故世界各国无政府，当以中国为最先”的命题^④，从而滑向了民粹主义的深渊。而“新世纪派”则坚信“有进化，无退行”的理念^⑤，斥责“天义派”的复古思想，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终极趋势，提出在新世纪与旧世纪之间有一个“新旧过渡时代”的命题^⑥，从而将无政府主义的实现推向了遥远的未来。“新世纪派”的这种把进化等同于进步的直线进化观又受到了章太炎的指责，“不悟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从而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俱分进化论”主张^⑦。三方相互攻讦，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导致中国无政府主义群体分崩离析。出现这种结局的根源，除了个人之间的恩怨外，归结到理论上，就是克鲁泡特金在拿“互助为一个自然法则和进化的要素”来修正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信奉的“相互斗争法则”时^⑧，他本身就是“一名修正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因为，甚至在他谴责别人从自然以及自然进化里学到的‘教诲’时，他自己也向自然以及自然进化寻求‘教诲’”^⑨。换言之，克鲁泡特金在解释人类历史发展时，仍是机械地将生物界的自然法则简单应用到人类社会发展上，因而是一种研究方法的简单照搬甚至错用。中国无政府主义鼓吹者各自遇到理论困境的根源，就在于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克氏研究方法的错用所带来的理论悖论。

① 太炎：《四惑论》，载《民报》第22号，1908年7月10日。

② 太炎：《五无论》，载《民报》第16号，1907年9月25日。

③ 太炎：《俱分进化论》，载《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

④ 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载《天义》第6卷，1907年9月1日。

⑤ 无政府党分子：《书天义报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载《新世纪》第24号，1907年11月30日。

⑥ 《新世纪之革命》，载《新世纪》第1号，1907年6月22日。

⑦ 太炎：《俱分进化论》，载《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

⑧ [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页。

⑨ [美]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89、392页。

客观地说,章氏“俱分进化论”的提出,已经意识到将自然界的生物进化学说应用到人类社会发展上去是一种方法论错用,并试图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区别开来,同时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又将学理研究的“求是”与“致用”彻底剥离开来^①,从而在其独特的哲学观领域进入了“五无”的虚无世界,而在现实领域却严厉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主张^②,这充分暴露出其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性。“新世纪派”则在达尔文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学说与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之间进行调和,强调“天演之淘汰与自然之进化,皆生存之大道也”^③,企图弥合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裂痕^④,亦是枉然。“天义派”更是遇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互助论的冲突,并注意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达尔文学说之间关系的论述^⑤,但却无力解决这一难题,以致武断地判定马克思“所谓‘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于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⑥,从而放弃了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引进及研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遇到的这一理论难题,要等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大面积传入中国并被国人自觉运用后,才得以解决。

(责任编辑:高建明)

^① 章太炎说:“哲学者,有学而无术,故可以求是,不可以致用”。太炎:《规新世纪》,载《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

^② 章太炎斥责:“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情状不相应。……为中国应急之方,言无政府主义,不如言民族主义也”。太炎:《排满平议》,载《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

^③ 民:《无政府说(续)》,载《新世纪》第36号,1908年2月29日。

^④ “新世纪派”指出:“近数年来,社会主义倡行几有一日千里之势,今人之反对社会主义者,往往以达尔文之进化学说为护符。其言曰:社会主义欲藉互助,使人人生存;而达氏则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乃天演之公理。由此观之,则可知社会党所希望者,皆属理想而不能实行者。冯氏著是书,即以科学之真理辟除今人之谬说,谓达尔文进化学说,非特不与社会主义冲突,实为社会主义立足之根据。”[意]冯鲁:《社会主义与实验科学》,载《新世纪》第45号,1908年5月2日。

^⑤ 刘师培指出:“近世言社会主义,必推阐历史事实,研究经济界之变迁,以证资本制度所从生。自马尔克斯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援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谊发明,然后言社会主义者,始得所根据。因格斯以为马氏发见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见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英]哈因秃曼:《社会主义经济论》,载《天义》第16—19卷合刊(春季增刊),1908年3月。

^⑥ 申叔:《〈共产党宣言〉序》,载《天义》第16—19卷合刊(春季增刊),1908年3月。